

欧洲马克思主义 的若干倾向

多中心论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

汉斯·海因茨·霍尔茨著

00
01
47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欧洲马克思主义 的若干倾向

多中心论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

〔西德〕汉斯·海因茨·霍尔茨著

施辉业、柯文、刘阳译

Hans Heinz Holtz
TENDENSEN IN HET EUROPESE MARXISME
Socialistische Uitgeverij Nijmegen 1975

根据荷兰奈梅根社会主义出版社1975年版译出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
多中心论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
〔西德〕汉斯·海因茨·霍尔茨著
施辉业、柯文、刘阳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75印张 75,000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800

书号 3001·1875 定价 0.39元

(内部发行)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汉斯·海因茨·霍尔茨，1927年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后来专攻哲学、艺术史和文学史，曾在西德一些大学任教，1971年后任西德马尔堡大学哲学教授。他写有批判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述多种，还写有《中国的矛盾——毛泽东政治哲学著作注释》（1970）一书。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霍尔茨在法兰克福大学等处讲授“欧洲马克思主义”，本书就是在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作者在本书中列举意大利、法国、东欧和南斯拉夫等欧洲马克思主义中的几种主要倾向，研究其不同特点，探讨它们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和原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各种倾向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在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况。作者的这些看法，可以供我们研究，所以将这本书翻译出版。

作者说明

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

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生，同形成了这些理论的国家的理论传统有联系。这本书试图用四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以阶级斗争为背景的反法西斯斗争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基础之上，所以就能够成为意大利文化传统的支柱。由于继承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传统的法国进步知识分子理论水平很高，法国共产党人被迫去适应存在主义；也就是说，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里贯穿着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这场革命给法国的民族意识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最后，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是在苏联的国家和社会理论同复活了的来源于启蒙时代的主张之间的冲突之中发展起来的。在南斯拉夫，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游击队的基础是小农，这种情况导致了合作化运动中的“无政府自由主义”思想。在所有这四种情况下，理论是以不同政见的形式发展的，党的正式理论则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为了论证偏离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学说中提出了若干假设，并由此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理论上的细微差别解释为未必危及无产阶级运动团结的历史和社会差别的表现。

目 录

作者说明 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

绪 言	(1)
第一章 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多中心论 的基础	(7)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马克思主义和 存在主义之间的对抗	(25)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或： 人民民主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	(46)
第四章 南斯拉夫——“直接民主”的 纲领	(67)
第五章 多中心论的未来和理论与实践 的辩证法	(96)

绪 言

从1930年至1955年之间的二十五年里，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其单一性。在六十年代，这种特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问题和理论出发点。这一切是无法否认的。当时，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法西斯侵略的威胁，这些威胁要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所谓铁板一块的“斯大林主义”阵线就是对这个时代的回答。

但是，“斯大林主义”这个术语把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同一个人联系起来，从而引起误解。合乎政治科学的分析应该在不考虑斯大林这个人物的情况下，说明导致了所谓“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条件。例如，维尔纳·霍夫曼指出了这种分析的轮廓^①，莫里斯·梅罗-庞蒂研究了莫斯科审判^②。在苏联被包围的年代里，苏联的共产主义表现了专制的特点，对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纯道义上的谴责，但这并不能导致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而如果想理解这些特点，并在将来避免这些错误，那就需要有这种认识。

① 维尔纳·霍夫曼《斯大林主义和反共主义》1967年德文版。

② 莫里斯·梅罗-庞蒂《人道主义和恐怖》1966年德文版。

苏共二十大变成了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舞台。但这种谴责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情用事，它并没有提出科学根据。此后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即苏联之外的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以突破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一书所建立的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哲学家们开始使马克思主义“非斯大林化”。他们根据本国哲学讨论的情况提出各种理论问题，以突破教条主义，而各国哲学讨论的情况则是由各国的特殊传统和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这样，在很少几年内就形成了好几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例如意大利、法国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另外还有南斯拉夫的形式，在斯大林同铁托决裂后它就形成了自己的面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二十年代出现并奠定其基础之后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主义之后”的流派或多或少受到了以黑格尔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存在主义的影响，最近也受到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在这些流派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相对地说，存在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分枝（萨特①、梅罗-庞蒂②和《现代》杂志小组③）正是代表了战后资产阶级哲学最进步的形式，它使马克思主义

①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法国著名作家和哲学家。自1934年起从事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靠拢法共，曾试图使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来对法共不支持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等作法不满，开始对法共进行批评或指责。在六十年代末也支持法国的青年和学生运动。主要著作有《呕吐》、《辩证理性批判》等。——译注

② 莫里斯·梅罗-庞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曾长期与萨特合作。——译注

③ 萨特和法共内一些反对派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办的刊物。该刊经常发表批评法共领导的文章。——译注

者有可能参加它提出来的问题的讨论^①。

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渗入了马克思主义体系这一事实提出的问题：这种混和什么时候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被抛弃，又什么时候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结构吸收新的因素呢？

各个国家的社会和历史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是否也同样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因为，各国具有独特性质的社会实践本身是不可分割地同理论相联系的。这种多样性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说某个观点是个“偏差”？持不同政见者能否用多中心论作为自己活动的依据？多中心论是否还可以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论据为自己进行辩护？这些问题对世界政治的意义极其重大，它们已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讨论。

我们打算在这里回答这些问题。答案只能在政治实践中找到，而它的基础必须是对每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特殊条件的准确认识。当然，在一篇只是大体上描写主要观点的文章里，不可能深入研究出现了西欧新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社会的特殊条件。所以我们更喜欢采用论文形式，这样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内部多元主义产生过程的某些特点，而不必详细论述它同整个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描述情况，而不是追溯根源^②。这就说明了这项

① 参阅汉斯·海因茨·霍尔茨《法国存在主义》1958年德文版和萨特《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德文版第969页。

② 这是发生学的方法：从其他更广泛的结构和关系中追溯被研究的主体的根源。——荷文译者注

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它致力于对一个现实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它阐明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轮廓，但不可能也不愿意超出这个范围。

我们没有讨论各个流派——例如意大利的或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化和矛盾，虽然这些内部分歧能够提供关于某一个学派的特殊矛盾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实质性线索。首先应当弄清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动机的基本形式；事实将表明，对许多问题的答案始终是由马克思主义在某地和某个面临的特殊问题决定的——也就是说，在意大利是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传统，在法国是多年占统治地位的存在主义，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未受批判的复活了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残余，在南斯拉夫是多民族国家的建设的特点和由于南斯拉夫的农业性质而形成的游击队共产主义。

这里的课题便是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许许多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理解方法和出发点；另一方面是真正的不同政见，也就是说，向反革命立场的过渡。多中心论是以正确的论据作为自己的依据的，它不赞成那些只是表面上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心的持不同政见的流派。具体地说：在意大利的葛兰西学派和法国哲学家加罗迪^①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这可能同这个事实有关，即意共参加处理意大利的国际关系——例如，它在欧洲议会里派有代表，它

^① 罗歇·加罗迪(1913—)，法国哲学教授，曾长期任法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议员，曾被视为法共主要理论家。1970年因指责法共领导坚持“斯大林主义”而被开除出党。——译注

代表侨居西德和瑞士的意大利工人的利益——从而直接参加解决西欧一级机构的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与此相反，法共还在为夺取政治决策机构里的地位而进行斗争。因此，法共常常不得不抽象地，即在脱离具体的、直接的政治的情况下，开展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阐明加罗迪或象波兰哲学家沙夫^①那样的人如何建立了自己的不同政见的基础，并不等于说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种做法首先仅仅表明，理论界在哪几点上对局势认识得还不够深刻和明确。可以说，这些弱点同有关的党在阶级斗争中所采取的矛盾立场有关。

因为，我们考察的前提之一是，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在客观的共产主义运动事态里，存在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相互之间差别很大的理论观点中得到反映。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国际上是由于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它们互相竞争，但在现代战争技术条件下，它们都已不能直接用军事手段击败对方；在国内是由于：第一，人们把世界政治范围内的要求纳入了国内战略；第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激化；第三，发展中国家里解放和剥削这两个相对立的过程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工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首要的要求；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第二项任务是建立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人民阵线。这种情况给自认为是革命

^① 亚当·沙夫(1913—)，波兰哲学家，曾任波兰社会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后因主张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而同当局发生分歧。1972年以来一直在维也纳任教授。主要著作有《语言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个人》等。——译注

的、但现在必须使自己的最终目标同这种明显不革命的政治行动互相调和起来的政党，带来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不言而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具体实现来说，这种矛盾不是一个障碍，而首先是一个促进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它一向是通过批判性地研究自己阵营里的矛盾而发展自己的。

第 一 章

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 多中心论的基础

正如在各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和争论那样，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向来对于应实行什么样的策略也存在着分歧。在巩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斗争时期里，即在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这种争论理所当然地是在苏共领导下进行的。因为，唯一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稳定对所有共产党都有利。这样，关于苏联是所有的工人的祖国这个神话也就形成了。根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制订国际主义方针的工作，完全由领导政治实践和正确理论的一个中心包办。共产主义运动被一种亲苏主义迷惑了，这种感情的基础是浪漫的情绪，苏联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英勇斗争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和苏联在战争中作出的难以置信的牺牲，使这种感情更加强烈。

被占领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反对德国人及本国通敌者的抵抗运动中突破了长期的孤立状态。他们在争取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里至少暂时实现了同其他人民团体的团结。统一战线突出地提出了研究本国的民族特征和实行革命政策的可能性的问题，而且要求各党独立地作出决策而再也不必去适应苏

联的外交政策。在成功地建立了群众基础的地方，共产党的信心增强了，每个党都结合自己的经验对自己的处境进行了理论分析。因此，在苏联的国家政治利益和各党根据本国特点为本国制订的战略之间，就可能出现分歧。而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靠苏联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加以消除。

在铁托采取不同于苏联的立场时，苏联还能借助正在开始的冷战的压力排除这个矛盾：南共联盟遭到了莫斯科的咒骂，被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意共并不同意中国人的想法，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领导下的意共拒不赞成苏共对中国同志的谴责，这个矛盾后来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陶里亚蒂在1964年8月发表的最后的备忘录，即他的所谓遗书^①里说：“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甚至超出思想分歧，在统一行动中和反对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斗争中团结起来，这是刻不容缓的和非常必要的。不能认为可以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排除在这种团结之外。所以，从现在起，我们不应该再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相反应当减少完成这个任务的困难。论战无论如何不必停止，但是在这场论战中，应始终以当前的事实为依据，以必须和可能实现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出发点。”再往下读就可以看到：“如果不认真地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正确确定我们运动的共同任务”^②。

① 即《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1964年8月发表于雅尔塔，中译文载《国际共运教研参考》1982年第2期。——译注

②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言论集》1967年德文版第215页。

正当反对中国的全世界共产党会议进入全面筹备阶段时，陶里亚蒂逝世了，这迫使他的追随者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公布他的《遗书》。这样，直到那时只是在党内表现出来的矛盾，便从策略问题变成了关于理论原则的讨论问题。现在，多中心论明确地同苏联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应当采取统一行动（也就是说，要接受苏联的领导）的要求对立起来。

恰恰是意大利党采取了这种有分歧的立场，这并不是偶然的。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意大利党经受了地下工作的考验，在战争中，它成长为游击队武装抵抗斗争的主要力量。在这些斗争中，它亲身体会到以民族利益为基础的独立的革命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在同非宗教自由派和左翼天主教的反法西斯力量结成的联盟中制订了自己的战略。富有斗争传统的强大工人运动的存在和为了实现社会和政治要求在不同阶级之间建立联盟的可能性，使意共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战略的新方面，即资产阶级民主应当是能够自动地被改造成为真正的民主的。刚才提到的陶里亚蒂的《遗书》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它把这种思想同对集中制的指责联系起来，在共产主义运动里，这种集中制仅仅起到下达公式化的、抽象的和在个别情况下毫无成效的指示的作用。陶里亚蒂是这样说的：“更深入地研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将使我们更加明确，在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制度的条件下，怎样能够为自由和民主制开辟道路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参加经济政治生活的最有效的形式是什么。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劳动人民有无可能在尚未改变其资产阶级统治本质的国家中争得权力地位；由此又引出一个问题，

即能否争取从内部逐渐改变这种本质。在那些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得象我们(和法国)一样强有力的国家里,这已成为当前政治斗争中的主要问题。……但是归根到底,深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还必须由各国党来完成。因此,恐怕可以说,采取某种一般的固定的公式仍然是完成任务的障碍”^①。

这种实际政治立场的理论基础是更早得多由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奠定的。葛兰西是1921年创建意共的人之一。他于1926年被捕并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因为在坐牢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损坏,在1937年就去世了。如同他这一代所有重要意大利思想家一样,他受到了意大利黑格尔主义的熏陶,意大利黑格尔主义的代表是乔瓦尼·金梯利^②和贝内代托·克罗齐^③。

按照黑格尔关于“客观精神”的概念,人类的文化产品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主体是历史的本体。有生产能力的始终仅仅是单个的主体,它是作为个人创造历史的;但是,只是当他同其他个人互相作用时——这种作用虽然完全是由规律决定的,但人们并不能事先准确估计其结果——他才能创造历史。由于各个主体互相调节,一个个的主体就变成了历史的本体。因此,历史同作为生物学物种的人

①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言论集》1967年德文版第220页。(中译文引自《国际共运教研参考》1982年第2期)

② 乔瓦尼·金梯利(1875—1944),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哲学家,自1922年至1925年任意大利教育部长。——译注

③ 贝内代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黑格尔主义哲学家。——译注